



骑自行车的日子

沈书枝

收鸭毛、收破铜烂铁的，每天要跑很多的路，大部分是男人，骑的也都是大车。“永久”牌，很高，很重，周身漆作黑色，前面有大杠，后轮的站脚不像后来的小自行车那样是一根斜撑的棍子，而是仿佛一个“山”字，两边是铁站脚，中间一竖恰是拉进去停好的后车轮。收东西的从这个村到那个村，骑着脚踏车，车后座的上面和两边挂几只蛇皮袋，里面鼓鼓囊囊地塞满收来的东西。

我和妹妹想要学骑车，就只有等爸爸有自行车的朋友骑车到我们家来玩的时候。偶尔也有远方的亲戚骑车来，我们就把他们的车子推到村外大路上去骑。车子太大太重了，我们只能勉强推动，大杠也太高了，我们的脚抬不过去，即便硬抬过去，车子也不常去骑了，坐在板凳上，脚尖尽力伸下去也没法把脚踏板踩到底。因此我们用的姿势不过是一只脚在脚踏板上踩半圈，另一只脚始终隔一会儿就在地上蹭一下，以给车继续前进的动力。有的小孩子会把脚从大杠底下的三角区穿过去，踩住另一边的脚踏板，身子猴得低低的，几乎像是挂在车子的一边。这太难了，我试过许多次，每次都是一伸过去就要摔倒，最后还是在地上蹭蹭。好不容易蹭熟了一点儿，觉得可以把脚提起来了，却已到了客人要回家的时候，下一次碰到客人来不知是哪一天，蹬车的技巧又早已忘光了。

等我和妹妹上初中后，一开始还是没有自行车，都是靠走。沿着村子外土路走十来里路，走到乡里的柏油路上，再沿着柏油路走五里，望见教室前一排尖尖的水杉树顶，就到学校了。有时村里骑车的同学，上学或放学路上正好在我们身边经过，假如没有带别人，而且不嫌带我们累，就会主动提出带一下我们。这车子的后座可以带一个人，我们个子小，前面大杠上还可以再坐一个，挤在骑车人的怀里，看前面的风景，觉得很好玩。同村有一对兄弟，童祝光、童祝芳，那时候他们的父母在东莞打工，兄弟俩都有脚踏车，常常在路上带我和妹妹。他们骑车骑得飞快，下大坡子也不捏到刹车，有一回在路上，童祝敏把妹妹从后座上摔了下来，他还浑然不觉，兀自往前骑呢。

我们那里最大的山头，叫峨岭山，旧时是318国道的一段，我们走上柏油路，正是在峨岭山脚下，旁边有一个水库。骑自行车的人到了这里，再往前骑个十几米，就挣扎不动下来了，喘着气把车推到顶上，再跨上去骑下坡。那一面的下坡更是陡得让人胆战心惊，初学骑车的人绝不敢轻易下这样的坡子，最陡的地方刹车要捏到最紧，才能控制住车轮急速的飞奔。男生们以能上峨岭山头不下车，下峨岭山头不捏刹车为光荣，于课外中学到了骑车上坡走“之”字形最省力的知识，因此上学日的清早，常常能看到一两个男孩子站骑在自行车上，在空荡荡的柏油路上扭来扭去地行着“之”字。这山头曾带给我惨痛的记忆。有一回，我们几个同学准备去班里一个女生家里玩，有车的带没车的，那女生骑车带我，结果下坡时拿捏不好刹车的度，我们连人带车摔了一大跤，在坡子上滚了几滚才停了下来。那天我第一次穿一件皮时刚刚流行到乡下的黑色健美裤，妈妈好不容易给我买来的，摔倒了爬起来，顾不得痛，已然看见裤子膝盖那里破了一个大洞。那一天，那个女生家也没有去成，大家都有点尴尬，纷纷作鸟兽散。

后来，已在南京工作的大姐给我们买回来一辆女式自行车。记得是非常好看的一辆，宝蓝色车底，上面点缀着金黄的星星和月亮图案。那时女式自行车在街上自行车店很常见，价格一百多元，然而图案大多是糊糊涂涂叠在一起的鲜艳色团，如我们的自行车这样清丽的很少见。一开始，我和妹妹十分宝贝这辆车，每天傍晚骑车回来，便拿一条湿抹布来擦灰，连轮子上的每一根辐条都擦到。害怕轮毂上生锈，家里没有别的油，就拿炒菜的菜籽油来擦。但没能坚持多久，大概过了一个多月，我们就像对待一辆普通的自行车那样，任它身上布满了灰尘，也懒得去擦一下了。

我和妹妹骑一辆车上学，一开始都是她带我。她虽比我晚学会骑车，带人却比我得当而自信。骑峨岭山头那个下坡总使我害怕。在后座上坐了一个月之后，我不好意思再坐下去，鼓起勇气带了她一次，从那以后，我们上学放学就轮流着相互带了，早上我带她，晚上她带我，或前一天我带她，后一天她带我。渐渐骑得熟练，逢到小的下坡，也不再捏到刹车了。如今回想起来，这是我们过往生活中最纯粹的一段骑车经历，乡下的土路上很少有

车，即便是柏油路上也少有汽车，只是有行人和偶尔从对面或身后而来的自行车、摩托车。做生活的人散在田里，放牛的人在田埂上百无聊赖地站着，每当有人经过，就抬起头看一眼。经过别的村子，池塘边洗衣洗菜的妇人，在清晨黄昏中拨出水流的声音，声声入耳。在这样的路上骑车，不像是后来在城市中骑车那样那样惊惶害怕，实在是愉快的。烦恼的是下雨的时候，在南方这样多雨的地方，我们没有雨衣，下雨天骑车，只能一手打伞，一手扶车把。只要风雨不太大，这也没什么，怕的是连日的阴雨，黄土路被雨水泡成一团烂泥，轮胎上粘了泥巴，常常和泥挡板卡住。我们经常骑着骑着就跳下来，在路边找一根小棍子，把车轮缝隙里卡着的泥巴挑出来，才能继续往前走。

上高中以后，学校离家更远，我们要走到峨岭山头，在那里搭乘到县城的公交车，要搭二三十里路。每周回家一次，骑车路程太远，我们只好把车放在家里，还是恢复走路的好习惯，每个星期日走到峨岭山头，再搭车去学校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长久地骑过车了。家里的旧自行车，后来还零星骑了几年，不知什么时候也就不见了。大学时曾买过一辆自行车，用以骑到另一个校区上课，然而学校里汽车与行人皆多，骑车总是让人慌张。我的个子太矮，坐在车上脚够不到地，遇到迎面来的车无法避让时，总要慌不迭地跳下来以免摔倒，久而久之便失去骑车的兴趣。那辆灰色的自行车，某一天我把它停在本部校园中，再也没有去找过它。未等到我毕业，它就随着校园里一大片长久无人认领的自行车一同被清理了。

后来在南京工作，起初也有过几个月骑车上下班的经历。城市早晚交通高峰的车流更是汹涌，我骑车时总有强烈的不安全感。直至一天下班后，一边骑车一边用耳机听手机里的歌，过一个黑洞洞的天桥下时，被潜伏在那里的小偷伺机从口袋里夺去了我的手机。那是二姐用工资给我买的新手机，价格在那时颇高，且刚用没多久。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阴影，后来很多年不再骑车，直到现在，在城市里骑车时也会小心地把手机藏在口袋深处。

一边骑车一边听歌这种自由，似乎只有回乡下时才能再安心享受，村子外的土路终于修成水泥路，原是更好骑车的了，然而飞驰在路上的汽车也多了起来，再想有小时候那样无拘无束地骑自行车的时光，是不可能的了。偶尔骑电动自行车经过镇上山头，它早已荒废，新的318国道不从这里经过，带走了绝大部分原来从这里走的人，还留在乡下的人也不多了。山头不再像过去看上去那样陡峭，仿佛降低了几米，变成一个平缓的长坡。山脚下的水库，从前我们夏天放学去那里，总要到水边的水跳(水泥板)上洗一下脸，洗一下手，把水泼到手臂上，凉一凉快，如今被高高的塘埂遮住，早已没有小孩子经过了。

摄影:刘耀辉 石延平

离别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母题。在浩如烟海的离别友情诗中，王勃以一首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突破了传统离别诗的悲戚基调，以其精神境界与艺术成就铸就了诗史上的一座里程碑。

回溯初唐之前的离别诗，已涌现出不少名篇佳句，它们大多以细腻的情感刻画与动人的场景描摹，为离别诗奠定了深厚的艺术基础，但在精神格局上却始终存在一定的局限。南朝才学横溢的谢朓，尚在青年时期就成为“竟陵八友”之一，他吟出的“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”的名句，以江河奔涌的壮阔之景，写羁旅离别之愁，虽意境开阔，但核心仍是“悲”字，亦未能跳出“离愁”的桎梏。

时至初唐，李世民的“别鹤栖琴里，离猿啼峡中”，卢照邻的“关山客子路，花柳帝王城”，都精准捕捉了离别时的细腻情感，构建了经典的离别意象，为后世提供了艺术借鉴。但他们在精神上多聚焦于个人离愁的宣泄，格局上多是对南朝江淹“黯然销魂者，唯别而已矣”的沿袭，仍然局限于“悲”的单一基调，缺乏对友情本质的深层思考。

王勃以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的惊天之语，为离别友情诗注入了全新的精神内核。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首联“城阙辅三秦，风烟望五津”，以雄浑壮阔的地理图景勾勒离别背景，没有丝毫悲戚之感；颌联“与君离别意，同是宦游人”，跳出个人情感，以“宦游人”的共同身份达成情感共鸣，将离别之痛升华为理解之契；而尾联“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”，更是以豪迈的劝勉打破离别的伤感，将友情从遥远物理距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赋予了其超越时空的永恒性。

吟咏离别友情的大境界



梁建民

王勃之“高”，首先“高”在精神格局的突破上。他不再将离别视为单纯的痛苦，而是将其看作人生旅途的必然际遇，将友情从朝夕相伴的世俗期待，升华为心意相通的精神联结。王勃之“高”，其次“高”在情感基调的革新上。他摒弃了涕泗横流的悲戚表达，以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的豁达与自信，结晶出了积极向上的离别观。王勃之“高”，还“高”在对于传统离别意象的重构上。他摆脱了“折柳”“猿啼”等传统悲苦意象的束缚，以“三秦”“五津”等雄浑壮阔的地理意象，赋予离别诗豪迈开阔的意境，实现了艺术形式与精神内涵的完美统一。这种突破，不仅是对前代离别友情诗的超越，更为后世离别友情诗的创作树立了全新的审美标杆。

王勃之后，离别友情诗不断涌现经典之作，它们或继承王勃的豁达基调，或在情感刻画与艺术表达上推陈出新。李白以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的夸张笔法，将友情的深厚具象化，语言质朴却情感浓烈；王维的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，以平淡的劝酒场景暗藏真挚情谊，“阳关曲”的旋律流传千古。他们将离别友情表达得更趋个性化、生活化，确实丰富了离别诗的情感表达。不过，李白的诗更侧重友情的“浓度”，王维的诗仍未脱离“无故人”的孤寂感，均未能达到王勃那种超越地域与时间的精神高度。

吟咏离别友情的主题，宋词的成就要远超前代，以苏轼的《临江仙·送钱穆父》最具代表性。“一别都门三改火，天涯踏尽红尘”，不写离别之悲，反以时空跨度凸显友情经得住岁月与距离的考验，铺垫了全词的旷达基调。“依然一笑作春温”的千古名句，将老友间无需言说的默契与深情写得真切动人，打破了离别词常见的悲戚套路。“尊前不用翠眉颦”，既是劝慰友人不必为离别伤感，亦为自勉。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堪称神来之笔，将离别之情推向更广阔的人生维度，既消解了离别的伤感，又赋予友情更加幽深长远的意义。

王勃与苏轼写离别友情的两首作品，在旷达内核上，一个是理想共鸣，一个是人生通透；在艺术表达上，一个是刚健语言显豪情，一个是婉约笔触衬豪放；在精神底色上，一个是初唐文人积极入世的时代精神，一个是北宋士大夫进退皆安的处世智慧。二者文体不同，且跨越唐宋，却共同突破了传统离别文学的悲戚基调，从不同维度诠释了“离别与友情”的永恒主题，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诗词“旷达离别”的两大范式。

元明清时期吟咏离别友情的诗词，虽也有赵孟頫、袁宏道、纳兰性德等文人的佳作，但从情感范畴、意向选择、精神境界这些维度去考量，难与王勃比肩，更遑论能出其右者了。

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的离别友情诗，王勃的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堪称巅峰之作。他以少年英才的豪情与远见，让友情在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的信念中获得永恒。这种突破与升华，达成了离别友情诗最豪迈、最豁达、最动人的表达。这种巅峰地位，在对前代的继承和对后世的示范中得以确立，并在与不同时代经典诗作的对照中愈加凸显其不朽价值。 摄影:刘明辉

始建于1937年的天津第一热电厂，其前身为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，1938年建成投产，一度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热电厂。此后经多次扩建，逐步发展成为京津唐电网的主力电厂之一。这座电厂始终与天津的城市发展紧密相连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为海河两岸的单位与居民提供集中供暖，温暖了整座城市。2011年11月，天津第一热电厂全面关停。这座陪伴了几代天津人、见证工业变迁与生活温度的老电厂，至此完成了历史使命，渐渐走进了时代记忆中。

2016年，更新改造项目组第一次走进这座老厂房。空旷高大的空间带来第一眼的震撼，红砖墙、牛腿柱、吊车梁与煤斗依然挺立，在寂静中无声诉说着这里



蝶变新生的城市空间(上)

原天津第一热电厂更新之路(下)

顾冰 周雨晨

房办公区。由于厂房内部结构复杂，不同年代的建筑交错叠加，我们在设计中的核心任务，始终围绕以下几点展开：理清各个时期建造的结构关系，判断哪些构件具有重要的历史保护价值，制定保护与改造方案，并最终为不同结构采取相应的修复与加固措施。

为了在保护好老建筑的同时让它适应现代商业用途，设计主要围绕两点展开：一方面，对厂房的核心区域进行重点保护和修缮；另一方面，对锅炉房等区域采取“保护性拆解与恢复”的方式——也就是在保留历史外观的前提下，调整其内部结构体系，为未来使用创造条件，这部分技术难度很高。实施过程中，广泛运用了三维激光扫描等数字化技术，为工程建立了精确的数字档案，不仅完整记录了建筑信息，更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空间改造中，协调多专业、多工序之间的交叉作业，有效解决了技术衔接问题。同时，我们还结合专业的文物考证与专项评估，在实施方案中注重精细化与创新性设计，最终在确保文物安全与功能实现的基础上，顺利完成了整个项目。

要让改造后的老厂房能顺利变身现代商业空间，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，就是如何让新建建筑与老厂房“和平共处”。既要严格遵守文物保护的规定，又要让空间满足商业运营的实际需求，这中间的平衡该怎么找？为此，方案设计团队在更新方案中大胆采用“时空交错”的玻璃盒子结构作为连接器，协调新旧建筑在体量与风格上的差异。这一大尺度的透明空间，既延续了老厂房的工业肌理，又以轻盈的现代语言建立起新旧对话关系，在碰撞中展现艺术张力，最终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平衡。

同时，充分结合地块特有的工业文化背景与海河沿岸的开放空间，让新商业空间与老厂房自然融合，打造出充满工业氛围的沉浸式场景。通过新旧建筑和谐共生，项目形成了复合多元的场所体验——既保留了工业记忆，又注入了现代活力。这不仅让历史厂区真正回归城市日常，也使工业文明得以延续，提供了休闲、文化与社交的新目的地，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这座拥有几十年历史的热电厂，其建筑材料与结构都带有鲜明的中国近代工业特征。从外墙的红砖、象征海河文化的波状雕饰，到代表电厂属性的电力符号，再到室内的牛腿柱、吊车梁、煤斗等兼具工艺与功能的结构构件，都是它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。在修缮过程中，我们始终坚持“原材料、原工艺、原形制、原做法”的原则，对这些历史元素、构件与工艺进行系统性保留与修复。设计也着重保留了原发电机组等关键工艺空间，确保工业遗产的完整性与可读性。如今，这座老厂房以新旧交融的姿态重回城市生活，正以全新的身份，向人们生动讲述着海河沿岸的工业历史与文化传承故事。

2022年12月，经过精心修缮与改造，原第一热电厂以全新姿态再次亮相。如今，这里已成为一座融合历史记忆与时尚潮流的大型商业空间，老工业遗迹与现代生活交相辉映，成为城市的新地标。

(顾冰系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；周雨晨系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工程师)

满庭芳

第五四三八期

2015年11月，天津文庙博物馆曾举办“掌中浮雕——艺术印章收藏展”，展出以铜章为主的各类艺术印章300余枚。精美的掌中浮雕让不少参观者认识到：这些走进博物馆的小小徽章，既是展示城市历史与特色的微缩名片，也是文博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天津文博事业飞速发展。截至2024年底，全市备案博物馆共有80家，包括文物系统博物馆、行业国有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，其中被评为国家一级、二级、三级的博物馆共13家。此外还有类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、科技馆、规划展览馆等多类社会文化服务机构，集中展现天津古今交融、中西合璧、多元并蓄的文化底蕴与城市魅力。

以博物馆为代表的社会文化服务机构发行的徽章，品种丰富，覆盖面广。企业、学校等单位的徽章更具有身份归属感，发行对象一般为职工或学生。体育赛事、文艺演出类纪念徽章更注重时效性，仅在活动期间发行。相较而言，文博类场馆常年对公众开放，徽章从发行范围与知晓程度上更具优势。一些场馆还专门设有文创开发与经营部门，其发行的徽章不仅有常规款，还有根据纪念性事件、特色展览、跨界联名等为主题的专属徽章，成为观众、游客较为关注的纪念品之一。

与参观券、展览折页、纪念封片相比，徽章精巧别致，材质坚硬不易损坏，不但可以静置收藏，还可固定在衣物、箱包表面，成为流动性装饰品。按照徽章呈现的画面内容，文博类徽章可大体分为以下几类：

第一类是馆名徽章，即画面主要为场馆名称。这类徽章多为长方形，近似于印章。如“觉悟社旧址”徽章，馆名由原觉悟社社员邓颖超同志题写。觉悟社是1919年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骨干创建的革命社团。1984年，在位于河北区三戒里的旧址基础上成立觉悟社旧址陈列馆，次年更名为天津觉悟社纪念馆。1986年，邓颖超同志到馆视察并题写馆名。徽章在很大程度上复原了馆内悬挂的馆名匾额样式，文字清晰。徽章基底为金色金属材质，章面以红色为背

景，覆盖保护层。另一枚“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”徽章，为硬塑材质，章面为王光英同志题写的馆名。作为2002年对外开放的天津第一座遗址类博物馆，其徽章以土黄色为底色，有考古发掘的含义。篇幅较宽，磨砂颗粒表面，深棕色的馆名文字刻印之上，颇具质感。

第二类徽章以场馆所在建筑为呈现内容。徽章章面上，不仅在外观设计上，而且在功能上也有明显特色。如我收藏的天津科学技术馆徽章，为金属圆章，章面以红色为底色，图案与文字填充为金色。画面上的中文馆名文字沿边缘呈半环绕布局，下方的“TSTM”为场馆英文名称的首字母大写字母。该馆于1995年元旦正式开放，时为国内规模最大、功能最完善的科技馆。徽章中心的建筑构图，通过寥寥数笔便将外形特色勾勒明晰。建筑外形寓意“跨世纪的桥梁托起明天的太阳”，极具特色。顶部巨型球形区域为宇宙剧场，安装有870穹幕电影放映设备和天文台象仪，可放映全天候科教电影和天文节目。

第三类为场馆标志类徽章。章面主要为馆徽，如图中未出现馆名，则多在徽章背面标注馆名。天津图书馆的圆形馆徽徽章，由两个相同的折线图案以不同尺寸重复组合而成，简约又彰显图书馆内涵。有着“海上故宫”美誉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在筹办期间，曾公开征集过标识设计方案，现今的场馆标识徽章边缘环绕有中英文馆名及“天津”“TJ”字样。画面以深蓝色为底色，突出海洋文化属性，对称的流动金色渐变线条，源于博物馆的建筑外形。背景图案的大陆板块与交织经纬线，烘托出海洋与人类的密切关系。徽章制作精细，层次分明，有效提升了浮雕感。

第四类徽章展现场馆的象征物或珍贵文物。以平津战役纪念馆主体建筑前胜利纪念碑为主要元素的徽章，可通过颜色、章形区分，款式多样。枪声纪念碑矗立在胜利广场，高64米。纪念碑在枪声与胜利的交接处上下各有三个巨型弹匣，标志着三大战役和军民推翻“三座大山”。徽章以传统象征元素传递历史厚重感，以简约构图与工艺细节反映现代审美，象征性与实用性兼备。

图为国家海洋博物馆徽章。



春至福来(中国画) 陈之海



沽上丛话